

余英时著

史學研究經驗談

余英時自署



邵东方编

余英时 著

史學研究經驗談

余英時自署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学研究经验谈/余英时著;邵东方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321-4068-8

I. ①史… II. ①余…②邵… III. ①史学-研究-中国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7890 号

封面题签: 余英时

责任编辑: 吕 晨

美术编辑: 王志伟

史学研究经验谈

余英时 著 邵东方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03,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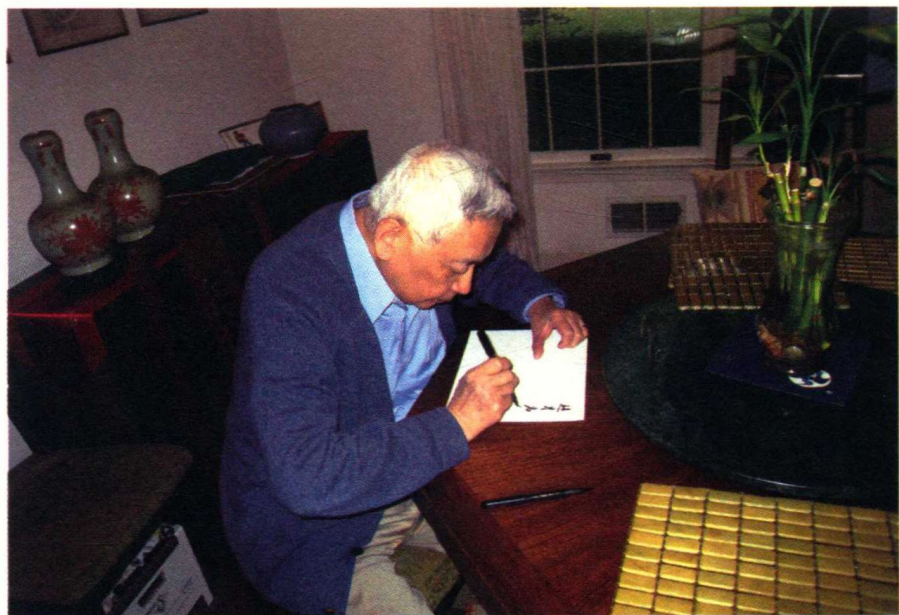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1-4068-8/B·38 定价: 3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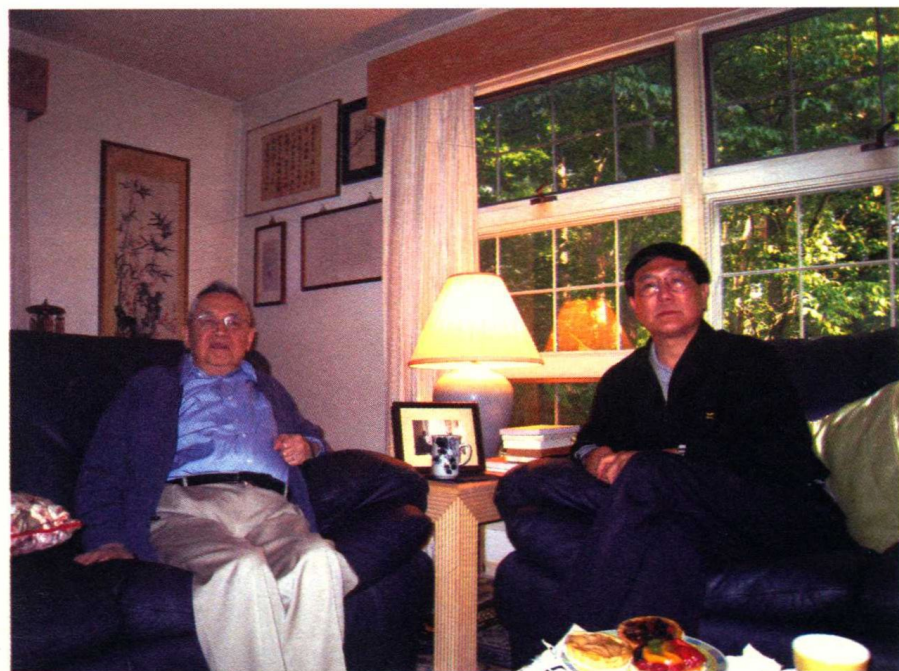
T: 021-57780459



余英时近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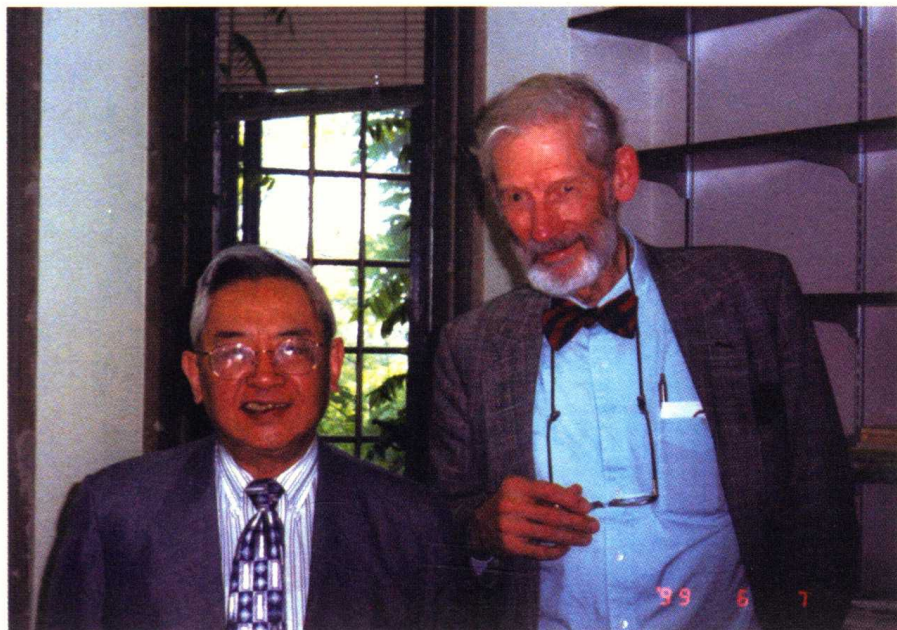


余英时于普林斯顿寓所为友人书写题词，2008年10月



余英时与邵东方（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于普林斯顿寓所，2008年10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余英时与倪德卫（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系教授）于普林斯顿大学，1999年6月



余英时与邵东方（时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办公室，1995年12月

超星名師講壇

文化傳承

同繫國運

勤懇努力

收穫無窮

二〇〇八年十月

余英時



余英时为“超星名师讲坛”书写的题词

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
纪念文集

余英時敬題



余英时为《王元化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题签书名

A general statement about David S. Nivison's
The Riddle of the Bamboo Annals
by Ying-shih Yü

Equally versed in early classical texts, oracle bone and bronze inscriptions, archaeology as well as astronomy, Professor Nivison has devoted the last 30 years to a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hronology in high antiquity. Taking as his point of departur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Modern Text" Bamboo Annals, an assumption diametrically opposite to the long received view, his approach has not only been revolutionary but also proved to be methodologically more fruitful in riddle-solving. The present volume, written almost wholly from 2000 to 2007, ~~the~~ therefore represents what is called "the final conclusions arrived at late in life" (wannian dinglun 晚年定論) in the Chinese scholarly tradition. This book is also a vivid testimonial to its author's moral and intellectual integrity as a scholar in defense of ~~historical~~ historical truth. In questioning the validity of the Chinese state-sponsored "Three Dynasties Chronology Project" in a most serious manner, Professor Nivison has fought most courageously against the totalitarian political manipulation and distortion of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As a result the much maligned Project has not been able to inflict great harm on the world of learning in the West ~~and China~~, or, for that matter, in China.

东方老弟：

这样称呼比较亲切，恕我僭妄。

《钱氏风述》已出版，带上一册。手边还有几本，不暇多寄。分送刘先生、邵先生，甘侯下次有书再补。

弟为改正有交，有白青藜文，出版时物，今已不及更正。（我记忆有误）好在书图定旨，所不钱先生付中（语）（十批书受此书之益）甚感其意，用意全同也。

近有一公文论费正清，刊在《时报》创刊三周年纪念，弟或可参阅。祝

新年如意

余英时 九一十二月十八

目 录

史学研究经验谈	1
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50
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探索	
——克鲁格奖获奖致辞	76
“国学”与中国人文研究	84
试论中国人文研究的再出发	112
环绕着“李约瑟问题”的反思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序	159
《朱熹的思维世界》增订版序	180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章学诚的生平与思想》中译本代序	191
《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集》序	201
一座没有爆发的火山	
——悼亡友张光直	207

追忆与唐长孺先生的一次会谈	218
---------------------	-----

附 录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手稿	229
-------------------------	-----

《〈天禄论丛——北美东亚图书馆员文集〉序》手稿	239
-------------------------------	-----

编后记	245
-----------	-----

史学研究经验谈^{*}

邵东方:今天很难得有机会请余英时先生谈一谈自己在中国学术史发展研究过程中的一些思想轨迹、经历以及经验体会。我想先请余先生大致说一下最近在日本的《思想》杂志上发表的讲演中的主要内容,尤其是与思想史、通史有关的一些问题。

余英时:我们可以就我这几十年来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些过程或者一些问题随便谈谈。你大概对我发表的中文的、英文的著作都比较熟悉,我想最好的方式也许是,你提示让我讲什么问题,我就这些问题谈一谈。若是我一个人单独说话就容易单调,大家或许会昏昏欲睡,我想我们还是让谈话轻松一点。去年日本请我去参加

^{*} 本文根据2008年10月3日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邵东方于余英时先生普林斯顿寓所作访谈记录整理。访谈稿或有疏漏错误之处,当由整理者负责。

他们中国学会的年会,那是他们关于中国研究的最大的一个会议。此前中国人在那里演讲过的好像只有胡适,他的演讲是在1927年,我去的时候是2007年,间隔整整八十年,这也是很有趣的事情。我在那里讲了我研究思想史的几个阶段,这是他们提出的问题,问我怎样进行研究,我就从先秦一直讲到明清。这就是后来你看到的那篇文章。^①

邵东方:这篇发表的讲演稿基本上是根据您当时的录音记录整理的吗?

余英时:不是录音记录,是我先写出来的。因为日本人要看到文章才能翻译,他们一定要我写出来,我就初步写了一个稿子。我讲的时候可能比这篇讲演稿详细,但是时间也不长,只有一个多钟头。我的基本意思是说,我们研究中国的东西,现在面临这一百多年来一直面临的一个困难。什么困难呢?就是我们不能像从前那样老是用经、史、子、集这种方式研究了,因为我们已经进入所谓现代的学术阶段。我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提出的问题及研究的方式都慢慢跟西方融为一体,很难分别了,实际上我们都是用西方的方式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这就引起许多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很容易削足适履,把外国的东

① 详见本书中的《综述中国思想史上的四次突破》。

西当作一个模式,把中国的材料尽量剪裁放进去。那是毫无困难的,你可以用任何方式,拿任何一个西方的理论,将中国的材料堆放在一起,然后把自己需要的材料挑出来,套进这个理论模式里面去,不管这些材料跟其他部分有无矛盾。这就是我们研究中国史学——特别是在“五四”以后——所遭遇到的最大困难。“五四”时期尚有一个好处,就是他们基本上还是接受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找一个专题来研究,这样问题就比较小。如果要解释中国从古到今的全部历史,从孔子甚至孔子以前一直到现在,是怎么演变的,又能划分为多少阶段,就很难跳出西方已有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根据西方历史创造的,西方的希腊罗马、中古、文艺复兴一直到现代,都有其阶段性。这种阶段性我们中国是没有的,把中国历史人为划分为古代、中古、早期近代乃至现代,都是非常勉强的,因为中国历史不一定包含这些阶段。虽然上古、中古这些名词过去都是有的,但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阶段。从前我跟许多中国国内的朋友谈过。比如刚刚过世的王元化先生,他很同意我的一个看法,就是我们必须在中国史料里面找它本身的脉络,只有这样才能追溯中国的历史,不管研究的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还是思想史。

邵东方: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余英时:我想这相当重要。今后我们要想打开局面,一方面要融入现代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式,另一方面又要避免为西方某些既成的模式所限制,或者变成它们的注脚,这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找一个西方公式填入中国的材料,那是最没有意义的,而且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我想三五年以后就没人看了。

邵东方:也就没有学术价值了。

余英时:学问也做不下去了。

邵东方:例如生搬硬套人类社会发展五个阶段的理论模式。

余英时:是啊。

邵东方:那您在这方面是否试图突破?

余英时:我们年轻的时候总是野心勃勃的,希望各方面都照顾到。像我年轻的时候,比如说早期在新亚研究所跟钱穆先生念书的时候,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史比较有兴趣,如社会经济文化等。我写的第一篇正式的学术论文差不多有五六万字,讲东汉士族大姓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他们跟社会变化以及东汉政权的关系等等。那时候当然受到马克思主义这套理论的影响,也希望从社会基础来看上层建筑。当然我并没有接受那样的公式,只是觉得应该注意到社会方面,因为社会方面也影响思想方面,以及人对

文化的看法,甚至会对某个政权选择依靠什么样的势力产生影响,这些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要根据原来的史料去重新建构。我那时候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到美国来以后,慢慢地,所谓社会经济作为一种下层基础对于上层建筑发生影响,这样的观念越来越薄弱,甚至于都没有了。不仅我没有,你看看现在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派,像前十几年流行的“新历史主义”,根本就不承认有上层建筑了,所谓上下层建筑的分别也就没有了。所以在这方面不仅我一个人变了,大家都在变化,我想我们目前看历史是多方面的。

邵东方:思想是能够相对独立的。

余英时:我本来的想法是每一方面的研究都可以进入,如果能多进入几个方面的研究,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即可考察这些方面跟思想方面的关系,也就是把几个方面综合起来研究。但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特别是中国历史那么长,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样繁杂的工作。所以只能找重点,我找的重点就基本上说,首要的方面是要注意中国历史长期的连续性,因为中国历史的连续性跟西方相比是很明显的。西方历史可以进行很清楚的阶段划分,从希腊、罗马开始,每个阶段都不一样,到中古又完全是另一个阶段,文艺复兴以后面貌又一变,然后是宗教革

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民主自由运动的兴起等等。但是中国看来看去好像都是朝代的变迁,只是循环而没有变化。其实这么说也不对,朝代循环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因为朝代本身只是一个记录,某个朝代并不一定代表某个阶段,其本身并不是阶段性的。

我们现在研究逐渐多了,受到西方、日本等方面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因为他们的汉文比较好,比西方学者要占优势,他们的研究也慢慢影响了中国。比如从前陶希圣先生编的《食货》,实际上是受到日本的影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根本上说都是从日本来的。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出来。日本人的许多研究,比如把唐宋说成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在日本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现在中国也有人讨论这个问题,就是唐宋变革论,认为唐宋是一个大变化。事实上明清也是一个变化,尽管它们是两个朝代,但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看,它们有连续性。明清在十六、十七世纪以后又有个大变化,这是我研究思想史得到的一些结论。从最早的孔子时代讲起,大家都承认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化的时期,其后的秦汉时代又有一个变化。但是魏晋时期中国分裂了。有人说中国始终是统一的,那也不然,其实中国历史上分裂的时间加起来比统一的时间长,至少两者差不多。因为殷商还不能算